

再论高考的教育功能

——侧重“高考指挥棒”的分析

郑若玲 宋莉莉 徐恩焯

摘要 一直以来,高考因其“魔力指挥棒”功能造成基础教育严重的“片追”、“应试”现象而饱受非议。本文通过梳理文献,分析考试与教育的关系以及“高考指挥棒”这一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现象所具有的积极作用,论述高考的教育功能。研究发现,考试引导教学的现象在古今中外都是普遍存在的。“高考指挥棒”纵有诸多弊病,亦具正向功能,有必要全面客观地看待考试与教育的关系,唯有如此方可趋利避害、兴利除弊,最大程度地发挥高考的教育功能。

关键词 高考;“高考指挥棒”;教育功能

作者简介 郑若玲/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厦门 361005)

宋莉莉/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厦门 361005)

徐恩焯/江西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南昌 330045)

高考自1952年建制发展至今已运行了65年,并且成了万众瞩目的“举国大考”。1977年恢复统考招生迄今也已40年,高考一直发挥着强大的教育、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功能,尤其对教育具有强大的核心指导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因其“魔力指挥棒”功能造成基础教育片面应试现象而饱受非议。“应试教育”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成了笼罩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上空的阴霾,也成为有志于教育改革人士心头攒聚的乌云。大家不约而同将心中的愤懑指向高考,批评指责之声不绝于耳,更有甚者,认为高考是“人神共愤的考试”^[1],炮轰之,欲废之。那么,“高考指挥棒”是否真的一无是处?笔者以为,考试对于教育的指挥作用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高考指挥棒”纵有诸多弊病,亦具正向功能,有必要全面客观地看待考试与教育的关系,以便趋利避害,充分发挥高考的教育功能。2005年笔者曾撰文《论高考的教育功能》,论述高考在牵制教育目的、引导教育过程和评价教育结果等方面的教育功能。^[2]但该文对历史和域外着墨较少,视野相对有限,且囿于篇幅,未对考试与教育的关系做深入分析。本文通过梳理文献,从历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教育学重点课题“新高考制度实施与动态调整研究”(编号:AFA170006)研究成果。

史、现实和域外等视角,进一步分析考试与教育的关系,尤其聚焦于“高考指挥棒”这一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现象所具有的积极作用,试图再论高考的教育功能。

一、考试与教育的千年纠结

中国作为“考试的故乡”,“考试指挥棒”现象不是当今社会所独有,古已有之。“考试”一词最早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考功名》:“考试之法,合其爵禄,并其秩,积其日,陈其实,计功量罪,以多除少,以名定实,先内弟之。”^[3]董仲舒所谓的“考试之法”主要指对官员的“考核”和“试用”,与先秦诸子的“选贤与能”思想乃至原始社会末期的“禅让制”思想一脉相承。^[4]考试诞生之初多为口试或面试,即先秦时的“敷奏以言”。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采用笔试的国家,并因此被认为是考试的滥觞国。汉文帝十五年(前165年)下诏令地方长官“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令应举者“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此次书面考试无疑是采用笔试形式,采用的题型是策问题,答案称为“对策”。此后,汉代诏举贤良方正一般皆由皇帝亲自命题并评定对策优劣。这种皇帝提出策问、举子对策回答,然后评定等第的书面考试方式,一直被沿袭下来,成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考试形式。^[5]

公元605年,隋炀帝设立进士科,从此,一种新型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登上了历史舞台。由于实行“学而优则仕”的竞争机制,上使帝制统治具有巨大的向心力,下对普通百姓具有极大的利诱力,科举考试很快成为社会的重心,并对其时的教育产生重大影响。自唐至清,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有如两棵相互缠绕的藤蔓,纠结达千年之久,最终,科举在二者的轻重变易中胜出,成为凌驾于学校教育之上的一种考试制度。^[6]

隋朝虽国祚短促,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并行不悖。科举创设之前,隋文帝即已设立我国最早的专门教育行政部门——国子寺(后改为国子监),设置专门教育长官——国子监祭酒,还开设了书、算、律等专科教育。由于隋初积极振兴教育,一度出现了“讲诵之声,道路不绝”的学术与文化昌盛景象,也为后世学校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隋朝虽开创了“分科举人”的历史,但由于科举创立不久即遭遇朝代更迭,科举考试在隋朝并没有真正得到发展,只是成为开创考试新纪元的一个“符号”。

到了唐代,高祖深知教育为立国之本,大力兴办教育。到了太宗时期,不仅大力发展学校教育,而且给予官学生一定的政治待遇,大大提高了学校教育的吸引力,中央官学发展为全唐最繁盛的时期,其影响甚至波及海外诸国:“贞观六年,诏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生能通一经者,得署吏。广学舍千二百区,三学益生员,并置书、算二学,皆有博士。大抵诸生员至三千二百。……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焜然勃兴。于是新罗、高昌、百济、吐蕃、高丽等群酋长并遣子弟入学,鼓箠踵堂者,凡八千余人。纡侈袂,曳方履,闾闾秩秩,虽三代之盛,所未闻也。”^[7]地方一级的学校规模,更是十倍于此,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唐代地方经科学学校学生,约计

有八万三千余人。^[8]与此同时,太宗又实行开科取士,到太宗、高宗年间,已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考试制度,成为后世科举的典型。因为没有偏废一方,这一时期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唐代前期举人比较重视两监出身的生徒,甚至出现“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9]的现象。可见,科举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向学风气。但武则天临政后,采取“重科举、轻学校”的文教政策,学校出身者仕途越来越窄,到了天宝年间,养成了“以京兆同华为荣,而不入学”的社会风气,以致唐玄宗为扭转学校教育衰颓的局面而敕令“罢乡贡”,规定所有举子皆入中央和地方官学才许应举。这一举动使学校教育的发展迎来了短暂的春天,但只过了两年又恢复了乡贡,且由于“重乡贡轻生徒”之势已成,学校教育终难逃离衰败的命运。

北宋初年,统治者非常重视科举选才,但却忽视学校养士。因此,宋初中央官学萧条沉寂,地方官学也零散不成规模。为了克服重科举、轻学校的偏向,庆历四年宋仁宗下诏:“士须在学习业三百日,乃听预秋赋;旧尝充赋者,百日而止”。^[10]这一举措将步入官学学习作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前提条件,改变了士人不愿进学的局面。此后,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又推行三舍取士,学生依据考试进行升级,最高等级的上舍生依考试结果“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11]三舍法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相结合,大大刺激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宋徽宗时期,蔡京进行了更为激进的改革,甚至一度罢废科举而全面推行三舍法。但因科举运行的强大惯性及其追求至公、广开仕途等为人称道的合理之处,科举考试最终得以“卷土重来”。北宋三次兴学运动在促进官学教育发展上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但并没有扭转科举考试对学校教育的支配局面。三次兴学不约而同地关注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的联结,使得学校教育渐渐溶于科举系统并逐渐沦为其附庸。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对学校教育的支配作用更为明显,学校教育甚至完全沦为科举的附庸。明初,选官制度实行“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12]的做法,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够谋得官职。与此同时,也规定“科举必由学校”,想要参加科举考试就必须接受官学教育,所以官学成为了科考做官的必由阶梯。按照“科举程式”的规定,明清的府州县学已完全纳入科举系统,县试、府试、院试即为学校考试,亦可视为科举考试,获得生员功名是为了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办学的目的就是“储才以应科目”,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联系因此更加紧密,甚至可谓已完全融为一体。因此,明清学校教育完全以科举考试作为指挥棒来开展教学,八股文为科举试文的固定程式,学校教育便以教习八股为重点,学风日渐空疏;不只官学完全服务于科举考试,清代一些大书院也配有科举生员的名额,甚者有所谓“洞学科举”的名目。^[13]

科举与教育的兴衰变易表明,科举考试在与教育的千年角逐中虽偶尔面临过衰落甚至被罢废的危机,但多数情况下占据主流地位,对教育有着强势的制约和指挥作用。如今的高考也如昔日的科举考试一样,对学校教育有着强大的指挥作用。“考什么便教什么,不考什么便不教什么”即是高考这根指挥棒魔力

功能最生动的写照。

二、“高考指挥棒”的主要弊端

“高考指挥棒”指的是高考成为所有教育教学活动的轴心。目前,在中考已实行“双轨分流”的情况下,我国普通高中只有单一的升学任务。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大量的学生无法升入优质名牌大学。这一矛盾迫使中小学校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为达到升学目的不断趋近高考标准^[14],造成高校招生的“过度选拔”。高考的科目、内容、形式也因此直接而全面影响着中小学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评价方法等诸多方面,显然,“高考考卷不但是一份考卷,而且是一根指挥棒。”^[15]以语文高考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影响为例。在“高考指挥棒”成为一种“新的习惯势力”^[16]的情势下,语文高考不仅影响了中学语文的“育人”目标,使语文“智力”培养成为第一目标,语文能力、审美情趣、个人情操等全面“育人”的目标被舍弃,而且阻碍了中学语文课改的实施,使得课改的内容无法到位、常常因“应考”需求而被裁剪变更,课程实施的手段方式也常依据高考需求而变更。此外,语文高考还影响了语文教育的评价,使学生的语文高考成绩成为评价教师语文教育业绩“最过硬”的关键性指标,语文高考对学生语文水平与能力的评价影响之大就更不言而喻了。^[17]语文高考对语文教育的影响只是高考影响中学教育的一个缩影,在教育实践中,高考对中学教育的影响不仅全面而深刻,并且还延伸到小学乃至幼儿园阶段。

因此,在高考这根“魔力指挥棒”的影响下,“一切为高考服务、一切给高考让路”成了响彻应试教育校园的大众口号,“高考”成了教师和学生日常活动的轴心与终极目标。一位经历过高考的大学生感慨道:“从初一开始我就是奔着高考那俩字去的,倒不是说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开始为高考做准备,但是在初中的时候就想着要上我们市里最好的高中,而到了高中就想着要上尽量好的大学。实际上现在回头想想就发现,即使我没有带着很重的功利心去积累每一点知识,但是每一阶段的目标还是很明确的,这明确的背后就像一连串的箭头,最终指向了高考。”^①

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对优质高校的激烈竞争下,“片面追求升学率”成了中小教育存在的一个最为普遍的问题。既然由高考考卷的分数决定学生人生的道路,平时的教学自然也就围绕着高考科目来开展。“考什么便教什么、不考什么便不学什么”成了约定俗成的提高备考效率、减少“无用损耗”的不二之选。片面的应试教育在提升备考效率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的负面问题。

从学生身心健康来看,由于平时只顾埋头苦读忽视体育锻炼,大多数学生的身体都处于“亚健康”状态,我国青少年近视率更是不断攀升。2010年《国民体质检测公报》显示,小学生、初中生及高中生的近视患病率分别为31.67%、

^① 资料来源于郑若玲为厦门大学2010级本科生开设的《中外高考概览》课程作业。

58.07%和 76.02%。2014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小学生、初中生及高中生的视力不良率分别升至 45.71%、74.36%和 83.28%。^[18]巨大的考试压力也让学生的心理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许多学生患上了“考试综合症”,轻者心理焦虑、神经紧张、失眠、学习效率降低,重者精神衰弱、谈考色变,甚至有学生因此患上了抑郁症,近年来关于学生承受不了考试压力而自杀的媒体报道也不时可见。

从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来看,我国大部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欠缺,更遑论较强的研究性、探究性学习能力。从小学到高中,学生几乎都是在老师一步一步的指导之下进行学习,很少有学生能够自由、自主、自觉地安排学习生活。久而久之,大部分学生形成了对老师的严重依赖心理,若没有了老师的指导,他们便茫然不知所措,“会考试不会学习”成了中小学教育存在的一大弊病,而且进一步对学生步入大学之后的学习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有些大学生在中小学时期习惯了家长和老师的日夜监控,进入大学之后突然没了管制,加之本身自我控制能力差,就出现了逃课、早退、沉迷于网络等行为,正如一名大学生在谈论大学生活时所说:“高考前被压抑许久的男生一上大学瞬间脱缰,通宵游戏、不写作业等等放纵行为,都是家常便饭。”^①而且,大部分学生在制定学习计划、进行时间管理等方面都存在问题。黄威威对 457 名大学生自主学习现状的调查显示:完全能够或者比较能够合理分配自己学习时间的大学生仅占 31.5%,大概只有 30%的大学生能够或比较能够通过制定日计划、周计划等短期计划来提高自己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而能在每学期开学前制定一个大致的学习计划的学生仅占总数的 28%。^[19]

从学生的知能结构体系来看,我国学生普遍缺乏体育、审美等一些高考不考的能力,就连高考重视的“智育”方面的知识也因片面的应试教育而被肢解变得碎片化。例如,阅读经典名著本应是静下心来细细欣赏其文学品味的过程,经典本是艺术,是拒绝功利的,然而,在高考的指挥棒下,阅读名著却变得急功近利,语文高考中关于名著的试题多以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等方式出现,考的是学生的“背功”而非理解与欣赏,以致有中学教师呼吁“高考,别再糟践名著了”,“高考如此考法,学生不读名著而只做名著阅读训练题。于是,书商们邀请‘专家’编写各种名著复习资料,把名著解剖瓜分,就像活体解剖一样,连一根汗毛、一络毛发都必须看得分明。名著被撕成了碎片,学生成了背诵复习资料的机器,名著阅读的一切意义全部垮塌了。”^[20]这种教学内容完全受高考指导而不顾学科原有知识体系的情况,除了语文学科,其他学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中学教师在教学中已经习惯性地根据高考考纲将知识分为三六九等,考试重点就多花时间,非重点就少花时间,考试大纲上没有的那部分知识自然就不必白费时间去学习了。同时,因为目前高考形式主要是纸笔测验,学生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以提高书面应试技巧为旨归的“题海战术”上,忽视综合素质、实践能力的

① 资料来源于郑若玲为厦门大学 2010 级本科生开设的《中外高考概览》课程作业。

培养与锻炼。“高分低能”成了如今经常用来讽刺学生的一个字眼。

除了上述几方面,社会各界对高考的抨击还包括:高考破坏师生、亲子之情;高考扼杀了孩子们的幸福,高考使学生丧失了学习的兴趣……等等。在很多人的眼里,高考已经“坏”透了,恨不得将高考这一“万恶的指挥棒”除之而后快。

三、“高考指挥棒”真是万恶的吗?

“高考指挥棒”是如何形成的?真是“万恶”的吗?我们该如何看待它?

(一)“考试指挥棒”是一种客观存在

虽然在高考指挥棒的“挥舞”之下中小学校普遍存在的应试教育饱受人们诟病,但是有考试就有应试,“考试指挥棒”即“考试领导教学”现象是一种避免不了的客观存在。“高考指挥棒”现象不独存在于我国,其他地方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

美国高校招生制度素来以录取标准多元化与招生方式多样化为人所称道,大学招生不仅考查申请者的大规模标准化考试 SAT 或 ACT(即所谓的“美国高考”)的成绩,还结合其中学学业表现、推荐信、课外活动表现、才艺证明、小作文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考量,“高考”分数不仅不是唯一的录取依据,而且还曾出现 SAT 满分者即所谓的“高考状元”及高中成绩排名榜首的“状元”被名校拒录的情况。^①因此,许多人以为美国基础教育无“应试教育”与“高考指挥棒”之虞。事实上,美国社会竞争压力之大让众多有志青年将进入大学尤其是进入常春藤大学等名校视为走向成功的第一步,大学的招生标准因此成为美国基础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的“指挥棒”。

在美国大学招生的多元标准中,高中成绩是与大规模标准化考试分数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考量依据,许多名校在招生简章上明确列出所要求或建议申请者在高中阶段所修习的课程清单,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建议学生在高中期间学习四年英语(包括持续的写作训练)、四年数学(申请工程类专业者要求学习微积分)、四年外语(要求是同一门外语)、至少两年的实验科学课程(申请工程类专业者要求学习物理和化学)、至少两年的历史课程。此外,普林斯顿大学还希望申请者尽可能修习并通过一些高难度课程如 AP (Advanced Placement 简称 AP)、IB(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简称 IB)考试,也希望他们提供一些大学和中学双认可的课程证明或英国“高考”A-Level 证书及其他项目文凭考试成绩等,并涉猎一些艺术领域的课程或提供艺术相关的优良业绩证明。^②因许多名校

① 详情请参阅以下两份文献:黄全愈《“高考”在美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9 页;Ema O'Connor. Sixty-Four Asian-American Groups File Federal Discrimination Complaint Against Harvard, BuzzFeed News, May 17, 2015 https://www.buzzfeed.com/emaconnor/asian-american-groups-file-discrimination-complaint?utm_term=.xvQXNyl7Q#.yga02qobr.

② 详情请参阅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办公室网站信息 <https://admission.princeton.edu/how-apply/academic-preparation>。

看重所修课程的难度,有条件的高中会尽可能开设 AP 课程或 IB 课程,学生为了提高申请名校的竞争砝码而尽量修习这些课程,学习压力随之加码。与此同时,为了在 SAT 或 ACT 考试中夺得优势,很多美国学生会选择上课外补习学校,接受有针对性的考前讲解和模拟训练。

更有甚者,许多名牌大学注重的学生“综合素质”也有相应的应试策略。为了提高孩子的特长专业素养,家境不错的家庭会为孩子提供一对一的训练和培养,条件一般的家长也会通过各种渠道为孩子寻找必要的训练资源。^[21]美国精英大学的申请除了看申请者的学业表现,也很重视其生活经验、课外活动、社会成就等。为了让孩子在激烈的名校入学竞争中占有独特的优势,家长们传统的做法是让孩子到当地的商店、旅馆、夏令营打工,每周投入大量的时间,干那些最枯燥乏味,最琐碎重复,工资最低的工资,减缓父母的经济压力,同时学习一下做人的基本道理。一些上层家庭则独辟蹊径,借助财政优势,掏钱让孩子到最艰苦的第三世界当义工。^[22]美国高中教育中存在的凡此种种应试现象,均为“大学入学指挥棒”所使然。

与我国同属“儒家文化圈”的近邻日本,同样非常重视考试与学历,日本国民人生幸福的前提就是通过高考进入名牌大学。日本的名牌大学几乎都是国立的,而国立大学在日本大学总数中所占比例非常小。所以,要想上好大学就必须经过激烈的考试竞争,日本的学生、家长、老师都把高考当做头等大事,高考自然成为了基础教育的“指挥棒”。日本的中心考试(即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组织的统考)深刻左右着高中教育已成为日本高考制度的核心问题。就这一问题,日本金泽大学附属高中化学老师榎田豪利结合自身教育教学体验谈到:“现在的学生最关注的是如何确保考试分数,如何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如何进入自己心仪的大学。决定授课内容的不是学习指导要领而是中心考试的出题方针,换言之基于中心考试的出题方针而编订的问题集决定着高中授课内容。”^[23]为了在统考中取得好成绩,学生课外还会到补习培训机构——“学习塾”参与补习。日本经济产业省最新调查显示,日本大小不同的学习塾已达 5 万多家,小学至高中生在学习塾补习的人数逾 500 万人,培训市场效益近 90 亿美元。迫于强大的升学压力,一个学生同时上 3 到 5 个补习班已习以为常。^[24]

在韩国,由于民众普遍信奉“教育等于成功”,帮助子女走向更高的社会阶层、获得经济和生活的成功被看成是教育的最终目的,而名校正是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经由修学能力考试(即韩国的“高考”)竞争进入名校,成为韩国学生和家长的普遍期待,中小学教育因此存在严重的应试现象,考取大学成了学习的唯一目的。为提高学习成绩,中小学生每天结束学校的课程后一般都会直接去各种课外补习班,接受辅导机构的“有针对性”辅导。“补习机构到处都可以看见,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每天学到深夜,包括周末和假期。”^[25]这种教育价值观造成了韩国学生巨大的身心重压。

国外教育界存在的以上“考试指挥棒”现象和我国存在的“高考指挥棒”现象说明:只要优质高等教育依旧是社会激烈争夺的稀缺资源,只要社会还需要

用客观公正的考试方式来选拔人才,考试引导教学的现象就必然会发生,“考试指挥棒”是一种避免不了的客观存在。

(二)“高考指挥棒”有其正向功能

在中国,高考是一项让人爱恨交加的制度。“考试制度确有十分严重的弊病,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即以考生的分数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统、背景、关系、金钱以及弹性极大的所谓‘表现’作为录取标准。”^[26]从某种程度看,高考固然剥夺了孩子们本该无忧无虑、轻松欢悦的童年生活,却也使得每个孩子享有“同样做梦的权利和实现梦想的机会”^[27]。这种说法最为恰当地反映了人们面对高考的矛盾心理。或许是由于考试竞争太过激烈,带给亲历者太过深刻的印记,人们对于高考的认识经由“情绪过滤”作用后,多数人只记得“高考指挥棒”的种种“劣迹”,而忘却或者说忽略了其积极作用。实际上,高考除了能选拔人才,还有“以考促学”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一作用,高考在为高校选拔优秀且适切的生源的同时,还发挥着重要的文化、教育和政治功能。

首先,高考有利于提升社会的文化水平。我国高考所考的中学基础课程,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千百年来积淀的基础知识的精粹,也是经过甄别筛选而来的先进文化。^[28]在高考“以考促学”的强势指挥之下,学校和学生不断加强对这类文化的教学和学习,有利于这些大浪淘沙的文化精华的传承与发展。同时,由于有考试必有备考,高考具有强大的以考促学功能,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的文化素质水平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如今的高考试题难度已远超刚刚恢复高考时试题的难度,这也侧面印证了高考提升社会总体文化水平之功。

其次,高考可以通过合理的命题来解决学生知识残缺、重知轻能等问题,有利于引导中学教育的方向。以2016年江苏省高考试卷为例。语文试卷的阅读材料选自张岱的《家传》、辛弃疾的《八声甘州》、沈从文的小说《会明》、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四书》等古今优秀文学作品,“这些经典文本,具有丰厚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依据这样的材料编制试题,不仅考查了考生的语文素养,而且考查了考生对我们民族经典文化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29]生物试卷的试题大多以生产实践、最新的科学进展和实验素材为背景,如2016年生物试卷第30题,以非洲地区高发的遗传病——镰刀形细胞贫血症与疟疾的地理分布重合为背景,考查了遗传规律、人类遗传病调查、基因突变和遗传优生等相关知识,同时还谈到了“疟疾克星”——青蒿素。这些试题既考查了学生知识的迁移与灵活运用能力,又展现了国内外生命科学的新进展。还有政治试题,以大学生“校园网贷”、大飞机研制、股市熔断机制、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信息安全、工匠精神、供给侧改革、海外投资纠纷的预防和解决等社会热点话题为背景,引导学生既“读圣贤书”又“闻窗外事”。一位大学生回忆高考时说:“我过去从不相信自己可以坚持每天看新闻联播,然而政治对时事的需要就让我做到了。”^①这些都

① 资料来源于郑若玲为厦门大学2010级本科生开设的《中外高考概览》课程作业。

说明高考可以对中学教育乃至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合理的“指挥”。

再次,高考可以体现国家意识,实施政治教化。由于高考对中小学教育的指挥功能,通过规定高考的考试科目、制定考试标准甚至直接参与试题编制等方式,国家便可以将政治理论、思想意志以及符合社会主流的价值观等融汇到中小学教育之中,如在政治科考试大纲中就包括对我国的政党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方面的考查。基于此,国家便可很好地实现政治教化,有利于民心凝聚和社会稳定。

高考在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于高校招生的考试制度,因此,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保障高校生源质量是“高考指挥棒”正面功能的最直接体现。相较于推荐制存在较大的信度风险,以考试方式选拔出来的人才在质量水平方面总体上还是更有保障。以往在评价科举制度时,不少人认为考试埋没了人才、科举只能选拔庸才,甚至认为科举状元也无真才实学。但只要客观认真加以考查便会发现,能够做好八股文、在科场中脱颖而出者,不仅总体上具有较高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质,而且由于长期受儒家“尊德性、道学问”教育的熏陶,多数进士入仕者较之捐纳保举或恩荫、胥吏之途入仕者,更重视名节、清正廉洁,具有更好的政治素质。^[30]同理,“文革”期间实行推荐制选拔的大学生源素质与1977年恢复统一高考后招收的大学生源质量,亦不可同日而语。虽说现在的大学生经常被嘲笑为“高分低能”者,但低分者中就会出现很多“高能”人才吗?总体而言,通过激烈的高考竞争考上大学的学生,不仅具备较好的知识基础,而且在“身经百战”的考试竞争中心理素质也得到相当的磨炼与锻造。因此,高考能较好地保证高校生源质量、保障高校的办学水平。

四、结语

历史上考试与教育兴衰互动的关系以及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考试引导教学的现象表明:只要考试仍作为获取社会稀缺资源的方式,考试引导教学的现象就必然会存在。换言之,“考试指挥棒”是教育与社会竞争的一种常态。就高考而言,“高考指挥棒”造成中小学应试教育确有其弊端,但它在维护国家统治、促进社会发展、引导学生进步等方面也具有积极功能。就中国的现实国情而言,统一高考制度在可见的未来将会长期存在,任何激愤的抨击都改变不了统考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这一事实。我们唯有直面高考指挥棒的两面性,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地发挥高考指挥棒的积极正向功能,才能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明智抉择。

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发挥“高考指挥棒”的正向功能可有如下思路:一是克服“唯分取人”的片面性。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继续试行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以及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制度改革。二是改革高考的内容和方式。提高考试内容的科学性,试卷命题由传统的知识立意转为能力立意,考试方式也不必拘泥于笔试,可综合运用口试、操作考试等多种方式。三是多管齐下改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弱化文凭在社会阶层流

动中的作用,鼓励人们探索多元的成才途径,淡化高考的不良竞争色彩。实践证明,只要因势利导、合理改革,高考这根指挥棒就不会“瞎指挥”,而能引导教育健康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15] 孙绍振. 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J]. 粤海风,1998(5):4-7.
- [2] 郑若玲. 论高考的教育功能[J]. 教育导刊,2005(1):4-6.
- [3] 董仲舒. 春秋繁露(中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5:225.
- [4] 田建荣. 中国考试思想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9.
- [5] 刘海峰. 第一次笔试在何时[N]. 中国教育报,2001-9-12(6).
- [6] 郑若玲. 科举启示录——考试与教育的关系[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2):15-19.
- [7]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第十八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5:5636.
- [8] 毛礼锐. 沈灌群. 中国教育通史[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480.
- [9] 王定保. 唐摭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
- [10] 李焘. 资治通鉴长编(卷147)[M]. 北京:中华书局,1978:3564.
- [11] 刘海峰. 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160.
- [12] 张廷玉. 明史(卷70)[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695.
- [13] 刘海峰. 科举学导论[M]. 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78.
- [14] 刘清华. 高考与教育教学的关系研究[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2-63.
- [16] 吴尚夫. 要教学大纲 不要指挥棒[J]. 语文教学,1986(8):48-49.
- [17] 黄真金. 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学之关系研究[D]. 厦门:厦门大学,2017:166-168.
- [18] 季雪峰. 三部委联合发文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EB/OL]. <http://www.sport.gov.cn/n321/n372/c777076/content.html>. 2016-11-24/2017-5-7.
- [19] 黄威威. 大学生自主学习现状调查研究[D]. 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4:22.
- [20] 孙善网. 高考,别再糟践名著了[N]. 中国青年报,2015-5-4(10).
- [21][24] 方勇. 发达国家教育的另一面 美国:快乐背后竞争无处不在[EB/OL]. http://educnr.cn/list/20161126/t20161126_523290422.shtml. 2016-11-24/2017-5-7.
- [22] 薛勇. 美国的高考指挥棒是怎么指挥的[EB/OL]. <http://edu.srnarnacon.com/1/2009-02-25/2116165173.shtml>. 2009-2-25/2017-5-7.
- [23] 胡永红. 日本高考改革中的高大衔接问题分析[J]. 中国考试,2015(3):32-37.
- [25] 赵同友,李锺珏. 韩国教育热的社会文化密码——从文化建构与解码的角度分析[J]. 外国教育研究,2012(6):57-62.
- [26] 雷颐. 珍惜考试[J]. 大学生,1997(10):24-25.
- [27] 顾卫临. 高考 还有更好的路可走吗[J]. 瞭望,1997(20):40-41.
- [28] 郑若玲. 高考的社会功能[J]. 现代大学教育,2007(3):31-34.
- [29] 周莉娜. 作文发挥空间大 数学上手易深入难[EB/OL]. <http://js.xhby.net/system/2016/06/08/028884491.shtml>. 2016-06-08/2017-5-7.
- [30] 刘海峰. 中国科举文化[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283-290.

On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ZHENG Ruoling , SONG Lili & XU Enxuan

(The Research Center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361005 , China ;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5, China)

Abstract :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has been criticizing a lot for its function of magic baton all the time, which makes the general education as an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Through discussing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s review and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aminations and education and its positive func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test-oriented education exists all times and in all over the world. Though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has many shortcomings, it possesses positive func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look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aminations and education with a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view. Only by this way, the benefits of this magic baton can be promoted, and its harms can be abolished as well.

Key words :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 examination baton ; educational function

(责任校对 张翔昕)

(上接第 68 页)

The Role and Behavior Motivation of “Bystanders Crowd” in School Bullying

LIU Xiao & WU Mengxu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 310023 , China)

Abstract : With the "bystanders crowd" of school bullying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his article redefined it based on the group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Gustave Le Bon. At the same time, "assistant", "strengthening", "outsider" and "defenders", these four types of bystanders are under research and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role of the bystanders in the school bullying is not the same, but group behaviors controlled by the group psychology are similar to each other in terms of generation and transmission, which will also be a negative impact on school bullying. In this study, five interven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cope with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crowd on school bullying in the aspect of the behavior motivation of the "bystanders crowd" of school bullying.

Key words : school bullying ; bystanders crowd ; Gustave Le Bon ; role ; behavior motivation

(责任校对 : 杨秀秀)